

20 世纪初杭州《译林》杂志的传播网络及编译群体

胡梦颖

提要：1901 年，中国早期的翻译杂志《译林》由日本东本愿寺所办杭州日文学堂师生发起创办，通过地缘和学缘关系聚集了以闽浙籍为主的一批知识分子，其中已成气候的开明士绅如林纤等通过自身的人际关系为杂志搭建起从译书汇编社到商务印书馆和中外日报社等的广阔传播网络，而负责译书的则多为系统接受新式教育的学堂学生，这批年轻译者如林长民等共聚杭州，砥砺学问，杂志停刊后多留学日本，以《译林》这个文化平台为基础，逐渐走出和传统士人不同的人生道路。研究该杂志的传播网络及译林社群体，将其作为育成新知识阶层的起点加以观照，恰能反映 20 世纪初杭州地方的新学传播情况和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

关键词：译林 林纤 伊藤贤道 林长民 林文潜

胡梦颖，女，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关于 1901 年于杭州发行的翻译杂志《译林》，学界目前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在民报勃兴的 20 世纪 10 年代初，它湮没在花样繁多的报章中不被关注。然而，当我们深入当时的历史场域，去重建《译林》及译林社背后的史实，却惊奇地发现，杂志远比想象中来得有影响力。在杭州当地聚合的这样一个译林社翻译群体，正是晚清社会知识分子结构转型的典型反映。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1901 年 3 月 5 日），在杭州日文学堂师生的共同发起及官绅的支持和（集资下），《译林》杂志于杭州银洞桥创刊，从第七期开始编行所移至离银洞桥不远的杭州万安桥小营巷口林氏家塾。杂志委托上海北京路的商务印书馆代印，共出十三期，于 1902 年停刊，停刊时间不详，其中第十二期发行时间为“光绪辛丑十二月”，第十三期则因脱期颇久，未署发行月份，经笔者推断停刊时间应不晚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 年 11 月）。

该杂志月印一册，每册 30 页，全为译书连载，在短短一年内，翻译出版了九本书，以财政和商业类居多，此外，颇有一些军政战史及法律类的译作，分别为《理财学》、《国债论》、《印度蚕食战史》、《维多利亚大事记》、《明治法制史》、《日本近世名人事略》、《世界商业史序》、《欧美漫游记》、《军国论》和《日用制造品》，及 1899 年至 1901 年世界各国政府统计表近 20 份，如《日本全国征兵核数表》、《日本现今岁计表》、《各国所出债券表》，《台湾现住户口表》和《奥匈合军常备军表》等。其中，多数译自日文，亦有少量译自英文。《译林》的翻译与杂志发刊前一个月即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 年 1 月 29 日）慈禧颁布变法上谕宣布推行新政有密切关联，其对财政和商业的偏好一方面延续了洋务运动时期对“求富”的重视，一方面则和庚子事变后清廷财政益发亏空，濒临崩溃有关。编译者担心每期 30 页的篇幅不足以容纳所译成果，还在杂志外单独出版了十多种单行本，皆为开风气之先之作，分别为《泰西政治类典》、《法兰西法律书》、《今时德意志帝国要典》、《欧洲各国宪法》、《各国议院章程》、《各国议院典例要略》、《法令全书》、《实验学校管理法》、《日本现行法令大全》、《国际公法摘要》、《斯氏哲学要义》、《银行论》、《金银货币论》、《泪香集》，多为法律类著作，可以说是清末中国最早讲求宪政、详细引进西方宪政知识的一批译作，除法律类译作，还有介绍斯宾塞哲学和黑岩泪香文学作品的译作。从翻译所选内容上看，译林社的选材颇有眼光，丝毫不落后于同时期留日学生所办杂志。

一、译林社开明士绅所搭建的传播网络

事实上，《译林》和著名留日学生所办杂志《译书汇编》的确从一开始就互通声气、互相代售，彼此间在学缘和地缘方面有密切的关联。浙江是国内最先且走在最前端的官派留日学生

省份，留日学生第一个翻译团体译书汇编社中三分之一以上成员皆为浙江早期留日学生，而其总负责人陆世芬即为光绪二十四（1898）年四月从杭州求是书院派出的学生。求是书院为杭州知府林启在任时建成，除此之外林启还恢复了养正书塾和东城讲舍，建成了另两所著名的新式学堂蚕学馆和武备学堂，他致力于兴办学校，开创了杭州近代教育的先河。而《译林》的编译成员中，林白水为求是书院总教习，其老师高啸桐（凤歧）是深为林启器重的幕宾，为杭州包括求是书院在内的新式学堂的创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译林》的监译林纤还受林启之邀主持东城讲舍，而《译林》发起人杭州日文学堂堂长伊藤贤道则受邀为求是书院和武备学堂讲授理化（普通学）。《译林》的这批编译成员都是围绕着知府林启在杭州兴办新学的开明士绅群体，而上述留日学生杂志《译书汇编》的负责人则为他们所办新式学堂培养的优秀学生，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学缘和地缘，在译林社存在的时间内，《译书汇编》在杭城唯一的代售点即为“杭州银洞桥译林”，而在其发刊后头一年中，除日本方面的广告外，所登载的国内各书籍报章广告更是只有两份，一份即为《译林》，另一份则为包天笑在苏州所办励学会下属两个事业，即东来书庄及会刊《励学译编》的广告。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包天笑亦是《译林》杂志的赞助者之一，杂志还称“苏垣励学社友函言是书（《印度蚕食战史》）已译竟，付刊作单行本”，因此暂停连载，以免重复，可见励学会和译林社常有书信联系。另外，两社间还互相代售书刊。包天笑之在苏州主持译书团体，是因江苏籍留学生如杨荫杭、杨廷栋等亦参与《译书汇编》杂志的编译活动，而包天笑和他们这批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受到影响，才办了励学会及《励学译编》。足见励学会、译林社及译书汇编社，同作为中国早期的翻译团体，互相之间多有交流，存在一定的群体认同。

此外，《译林》创办伊始就和当时各大书局报馆如张元济所办商务印书馆、包天笑主持的金粟斋、汪康年所办《中外日报》及梁启超主笔的《清议报》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它们的支持。

《译林》的刊印原打算借用浙江按察使司衙门内所藏木板活字，后因印刷效果不够清楚，遂全权托付给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刊物不仅专为商务印书馆开辟一栏刊登其承接印刷服务的广告，代售商务的各种书籍，还在社内另提供有价目清单。《译林》还代售有金粟斋的《地理学讲义》、《日本宪法义解》、《皇室典范义解》、《日本地理志》、《西洋教育史》等书。除此之外，《译林》杂志每期在《中外日报》上必刊登有广告，从第四期开始，广告甚至开始占据《中外日报》的头版，并配以醒目的大标题，从第六期开始每隔2-3天即刊登一次广告。鉴于《中外日报》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发行量，可以说《译林》的广告力度颇为不弱。而杂志在未发刊前就已在《清议报》上刊登了林纤所写的《译林序》和《译林简明章程》，发刊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清议报》一直持续为《译林》刊登广告。

这些译林社的网络和作为杂志监译的林纤颇有关系。光绪八年（1882）林纤和郑孝胥、高啸桐同为福建壬午科举人，有同乡及同年的深厚交谊，和高凤谦的弟弟、时任浙江大学堂（即求是书院、求是大学堂）总教习的高梦旦亦颇为相熟。而当时郑孝胥和汪康年之间关系至深，高梦旦曾为《时务报》撰稿，和总理汪康年亦非常熟悉，林纤译出《茶花女遗事》后，在高梦旦和郑孝胥的推介下，因译书出版事务逐渐和汪康年结交，《译林》之在《中外日报》上刊登广告，应和这层关系有关。另，《译林》准备印行时，夏瑞芳等人所办商务印书馆刚好于1900年盘进日商在上海的修文书馆印刷器械，以印刷质量优于同行奠定其在上海一带的知名度，张元济、蔡元培及其他维新人士，皆因“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遂“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扩大其事业”。而林纤的友朋圈中，包天笑即为当时金粟斋的主持人，且和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常相往来，郑孝胥又是当时商务印书馆投资者张元济的至交。

好友，林纤的另两位好友高啸桐和高凤谦兄弟更是分别于1902和1903年入了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由此，杂志想到委托商务来代印，以及大量负责代售金粟斋的书籍，这都可以从中得到理解。不过，笔者还发现《译林》代售书中的商务所出书籍，唯独日本人冈本监辅的著作被单独强调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涉及到《译林》作为一份日本东本愿寺所办杭州日文学堂内部师生同办的杂志，其和日本之间的亲密关系。

冈本监辅年轻时在日本以去库页岛探险而勇名远扬，后和吾妻兵治共同创办善邻译书馆，该译书馆通过翻译向东亚诸国介绍明治日本成功经验，以追求兴亚为目的，和著名的东亚同文会一样，是日本亚细亚主义的团体。冈本本人和中国维新人士关系密切，曾于1875、1876、1900、1901年数次访问中国，其很多著作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产生过极大影响，如《万国史记》、《铁鞭》和《西学探源》等。而日本东本愿寺的佛教徒亦为兴亚会（后并入东亚同文会）成员。

，东本愿寺在中国传教行为本身就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及其对清战略有深刻的关联。

由此，冈本监辅于1901年3月10日从上海到杭州，直接赴本愿寺别院与好友、杭州日文学堂堂长、《译林》杂志的监译伊藤贤道相见，并在其陪伴下游历了杭州各处景点。与此同时，日文学堂学生和监译林纤与日本教习友情深厚，学生们更是坦言无法忘怀老师们的恩情，石门县知事林孝询作为《译林》杂志核心译者林长民之父，还为学堂捐款，资助学堂购买化学器具还有药品，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甚至派兵船护送日本教习赴上海避难。林纤及林孝询作为伊藤的好友，在冈本赴杭时与其结识并产生友谊，林纤还和伊藤一同为冈本所著《日本中兴先觉志》作序，另为《铁鞭》一书作序，足见译林社群体和冈本之间的亲密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冈本所著《西学探源》为《译林》杂志代售广告中唯一一本列出作者名字的书籍，亦是商务印书馆在《译林》代售诸书中唯一一本被列出书名的（其它的统称为“商务印书馆各种书籍”）。

因此，鉴于译林社的该日本背景，杂志除了和上述各大书局报刊之间的联系，亦和东亚同文会支持下的日本人创办的《同文沪报》互相代售，这也成为情理中事。

《译林》还通过官方途径得以传播。杂志最大的赞助人之一为历任浙江按察使属下各种重要职务、后为洋务局督办的许豫生，而许氏为林纤的同乡及画友，《译林》出版后，许氏即下发《伤通省购阅（译林）札》一文公开命令各府州县、书院义塾订阅学习，称“《译林》一书所列政学、史学、商学、法律等，俱深得东西各国富强之旨，可以大开民智，广导利源，询非今日所行各报可比”，杂志也坚持每期都投递给洋务局。此外，地方官员洪述祖和张其昌等亦对杂志大力赞助。这从政治层面确保了该杂志的顺利发行和传播。

在译林社开明士绅的努力下，《译林》杂志最终搭建起辐射闽浙、两江、两湖和两广的28处代售点及东京和横滨的传播网络，确保了杂志所译新学知识在当时能得到有效的传播。

二、传播网络下的年轻译者群体

这样的传播网络为译林社译者构建起了一个良好的文化平台。《译林》编译群体除了发起杂志的东本愿寺杭州日文学堂学生外，还有通过地缘关系聚集的一批译者，他们多为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堂学生。这批学生译者在杭州地方具有开新思想的传统士绅支持下，出版了寄托他们共同理想的翻译作品——《译林》杂志，而这又为他们接近更上层的人物提供了机遇，使他们得以进一步参与各种新学传播相关活动，抬升个人社会地位，走出了和传统士人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译林》的译者中，目前可确知为杭州日文学堂学生的有林长民、褚垣、金保康、陈福民、林志昭、王兆相、徐鼎和林文潜这8位，他们中除来自省城杭州外，还有从浙江小县城海宁、瑞安，以及其它省份如福建和江苏赴杭学习日文的。其它译者还有林白水、徐超、陈超立、朱佐清、刘永龄、陆康华、魏易和萨端，加上两位监译伊藤贤道和林纤，共18位编译成员。除日本人伊藤贤道外，这18位编译成员中，7位来自福建的侯官和闽县，7位来自浙江，另有3位则来自江苏。另外，杂志的赞成诸君中有6位来自江苏，2位来自福建，3位来自浙江，此外，还有一位在杭州当地任教的日本教习三宅缝造。

可见，译林社的成员多为闽浙地区的知识分子，习惯相近，语言相通，自然容易聚集在一起。当然，杂志的创办，除同乡之谊外，还基于同学之情。杭州日文学堂的这群学生在学习之余，为了“稽各国掌故，究各种学术”，译书并互相观摩，但因所译诸书“或卷帙繁重，旦夕难成”，而朋挤中也“颇有急于先睹者”，遂决定以杂志的形式“随时汇印成册发行”，林纤曾在《译林序》中写道，“近者，及门林生长民，盛称其友褚君，及林、徐、陈、金数君，咸有志于此，广译东西之书，以响士林”。当然，杂志的创办也和堂长伊藤贤道早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就想要开设学堂附属译书局的打算有关。

发起杂志的学生译者中以林长民为核心力量。林长民早年就随加拿大籍华惠德和日人嵯峨峙学习过日文，语言基础较其它学生为好，且林长民之父林孝询和杭州日文学堂关系密切，《译林》杂志后半期的编译所就设在林氏家塾中。林父以开通地方风气为务，为“闽籍宦浙”的著名贤吏，是当时杭州知府林启的属下。而林氏家塾不仅聘请当时颇有排满思想的林白水和古文大家林纤为东西席教习，更是当时闽籍寓杭开明士绅经常聚集的一个场所。

受老师们和父亲的影响，林长民从 1897 年中秀才后就无意于科考，放弃科举，转而入日文学堂学习。而另一位译者林文潜亦是如此，不以科考仕进为读书目的。林文潜字左髓，是孙治让于 1896 年所办浙江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瑞安学计馆的高材生。还未赴日文学堂学习时，就为当地开风气之士，对时势观察敏锐，广阅报章，有志著述，颇为瑞安当地普通士人所敬重，1901 年更是决定走出家乡瑞安去省城增长见识，“到杭城中段银洞桥译林书塾（即杭州日文学堂）学东文”。

杂志从第三期开始，邀请了精通英文的魏易及上海东文学社的高材生萨端同为译员，他们也都是接受新式教育培养的学生。其中魏易为杭州人，字聪叔，1896 年入上海圣约翰书院就读，四年后年学成毕业，在杭州和林纤一边翻译《黑奴吁天录》，一边从事《译林》的编译。萨端则为福建人，是罗振玉 1898 年所办上海东文学社学生，在 1900 年就已译出了《台湾人工孵化鸭卵法》、《畜疫治法》和《草木移植心得》等书，在编译《译林》的同时，更是翻译出版了影响极大的《西洋史要》和《地理学讲义》。

这些译者都是在新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堂学生，和经历了甲午、戊戌及庚子后对清廷统治彻底失望并拒不出仕的开新士绅如林白水、林纤，就这样共同聚集于译林社这个翻译团体，互相砥砺学问，以译书寄托他们“开民智”的共同理想。正如林纤在《译林序》中所说，“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

在这样的编译氛围中，译者的日文水平显著增长。如林文潜在编译《译林》的同时还就日文学学习心得撰写了日语学习书籍《寄学速成法》（原名为《广和文汉读法》，译林社还为其在《中外日报》的《译林》广告边上刊登出书广告，此书在当时颇有影响力，被认为“较《和文汉读法》为详”。。在译林社编译期间，林文潜因日文能力深受蔡元培赏识，被招人南洋公学特班。就读期间兼译课本，于光绪二十八年（1908）春译有《哲学源论》、《政治原理》等书。四川谢无量创设支那翻译馆，林氏亦被聘从事译述工作，一时以日文翻译闻名。林氏后来不仅与蔡元培共同筹办成立“爱国学社”，返里后还创办日文速成蒙学、瑞安速成公塾、瑞安演说会和天足会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又与孙治让组织师范教育研究会。可以说，林文潜通过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就读新式学堂，编译东书，逐渐成为瑞安当地颇有地位的新兴士绅，而其走出瑞安逐步抬升其社会地位的起点，则发端于赴杭州日文学堂及对《译林》编译活动的参与，正是在《译林》从事翻译的这个平台，给予了林文潜展示自己能力并为世人所知的机会，使他得以进入更广阔的社会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理想。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26 岁的林文潜自费到日本留学。和林文潜一样，1902-1903 年间译林社编译群体亦相继赴日留学，去更广阔的天地求发展。笔者推测《译林》的停刊，很可能与此相关。目前可确知留日的译员有林长民、王兆相、林白水、金保康、陈福民、林文潜和萨端等 7 人，占译员总数近一半之多。且令人惊异的是，留学期间，这批译者因事先在国内打下的扎实的新学基础，纷纷成为留日学生中的骨干力量。

留学生最初组织的团体为励志会，该会渐渐分化成激烈和稳健二派，稳健派渐与官场接近，而激烈派另组织革命团体如支那亡国纪念会、东京青年会等，发起拒俄义勇队及鼓吹起义和暗杀的秘密团体军国民教育会。译林社主要编译者大多成为激烈派中的重要领导。癸卯年（1903 年）召开拒俄大会时，林长民为留日学生总会书记干事。会议当场签名志愿人拒俄义勇队的人员中，林白水为丙区二分队队长，王兆相为负责福建的各省分会职员长，金保康为负责浙江的留日学生会各省分会职员长，林文潜则被温州留日学生公举为代表归国请愿，回籍宣传商办。后义勇军被迫解散，部分激进会员改组成立军国民教育会，萨端则继续为其中的成员。。一方面，可以看出闽、浙、苏东南沿海三省间的地缘关系及译林社时期的学缘关系，在该时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之间的群体认同，另一方面，鉴于《译林》杂志所译内容多开风气之先，这批译者之纷纷选择出洋，并成为激进派中的骨干力量，很难说和当初共聚《译林》杂志译书并互相切磋学问的经历和识见没有关系。

此外，在回国后《译林》的编译经历对这批译者也依然有影响。林白水由日返国后主持编译了商务印书馆的“少年丛书”。编译内容多为西方名人传记，其中出自林白水之手的有《华盛顿》、《傅斯麦》、《大彼得》《哥伦布》等六种。该丛书颇受欢迎，长盛不衰，从 1909 年至 1930 年共发行过十三版，《大彼得》甚至发行了 19 版之多。事实上，《少年丛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来自当年《译林》杂志翻译时所用的一套日本博文馆丛书，有意思的是，这套日文书也被称作“少年丛书”，可见《译林》时期编译经历对译者及其译业影响的一斑。

虽然《译林》存在的时间有限，但其译者日后仍多坚持从事翻译事业。如林白水还译有野田义夫，《日本明治教育史》、《英美法》等，林文潜还曾根据中村正直的日译本，以《论邦

国及人民之自助》之名翻译了英人斯迈尔斯的《自助论》；林长民参与了“闽学会丛书”的译介，译有日人斋藤阿具的《西力东：侵史》；魏易除和林纤合作翻译外，独自翻译了大量作品，如狄更斯的《双城故事》、大仲马的《苏后马而·惨史》、勒东路易的《冰萦余生记》及《泰西名小说家略传》、《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三卷》等；陆康华则于 1905 年 2 月与黄大钧合译有柯南·道尔的《降妖记》；王兆楦和杜亚泉、寿孝天合作编译了 4 册《高等小学最新笔算教授法》，于 190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等。

除了继续从事翻译活动，译林社的译者，有成为地方新兴士绅者，有成长为知名翻译家者，更有日后积极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者。如金保康留学回国后被重用，为法政科举人，历任湖北宪政调查局局（长）、奉天交涉司疆界科科长、浙江都督府秘书、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国民政府外交部科长、上海市政府秘书，并编著了大量法学书籍和教科书。陈福民历任北洋政府江苏、湖南等省高等检察厅厅长，1920 年至 1926 年，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林长民归国后就任福建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兼福建咨议 1 局书记长，后投身革命活动，民国后任内务部参事、法典委员，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国四（年）起历任国务院参议、法制局局长、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国联同志会理事，后还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他们之成为法律方面的专家，自是和留日经历密切相关。但也可以说在《译林》时期通过翻译早早接触到法律和宪政方面的知识，为其奠定了初期的知识基础。

三、结 语

20 世纪初年创刊于杭州的《译林》杂志，就是这样一个新知识阶层育成的起点，这些译者的成就，可以说离不开最初在《译林》杂志编译及在杭州日文学堂接受教育所奠定的基础。对清廷的统治业已产生一定离心力的旧式开明士绅，以他们所构建的人际和传播网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文化平台。这批新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选择新式学堂就读，在系统的东文或西文知识的训练下，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思想，他们借助开明士绅所提供的力量，利用自己所学的新学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选择并逐渐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发展道路。研究翻译杂志《译林》的传播网络及其译者群体，恰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晚清社会知识分子结构转型的过程。

当然，还原这份在翻译内容上开风气之先的《译林》杂志及其编译群体被遮蔽的一段历史，亦有助于我们了解 20 世纪初年杭州新学传播情况的一斑，探究其颇为广阔的传播网络，更是有助于知悉当时杭州上海等地出版编辑团体间的互动。

责任编辑：项义华